

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差异与中美贸易收支失衡

周 宇

内容提要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工资的上升速度不仅远远高于美国工资的上升速度,而且也远远高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速度。通常这一变化应该引起中国对美贸易收支顺差的减少,但实际上,这一顺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这是我国对外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反常现象。本文将从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动态变化这一视点,探讨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劳动生产率 工资变化 中美贸易 汇率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964[2007]10-070823-0645

从对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影响来看,工资的上升与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发挥类似的调节作用。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的实际工资基本上维持了两位数增长,而且,中国工资对美国工资的相对增长速度要远远超过人民币升值速度。通常,工资的快速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应该引起中国对美贸易收支顺差的减少。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一结局。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即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如果一国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快于工资的上升速度,通常会引起贸易收支顺差。当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快于工资的上升速度时,我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会出现下降趋势,企业的盈利空间会持续扩大,这一状况为企业降低价格促进出口提供了可能。其结果,贸易收支顺差的扩大会诱发本币名义汇率的升值压力。

基于以上判断,本文将从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动态变化这一视点,探讨中美贸易收支失衡的原因。

一、工资与贸易收支顺差的同步增长

2005 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的直接原因是经常收支顺差出现了扩大趋势。那么是什么助长了经常收支顺差呢?通常人们倾向于认为低工资竞争优势是推动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静态的意义上,尽

管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形成,但是从动态的意义上,我们却无法解释,在我国工资水平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为什么经常收支顺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扩大趋势。如图 1 所示,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工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美国。进入 21 世纪后,以中国两位数的实际工资增长为背景,中美工资增长速度的差异出现了扩大趋势,这意味着中国与美国的工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中国的低工资竞争优势正在出现下降趋势,劳动力成本的这一变化通常引起中国对外竞争力的下降,而后者会引起经常收支顺差的缩小。但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的经常收支顺差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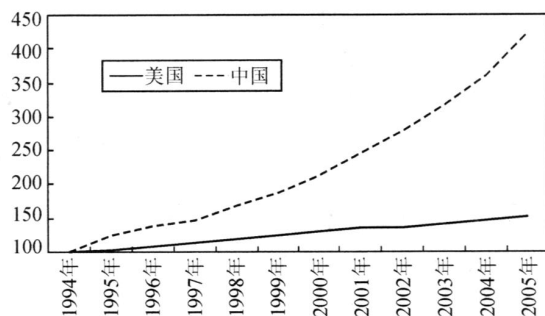


图 1 中美工资增长指数比较 (美元计价, 年为 100)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网上数据库;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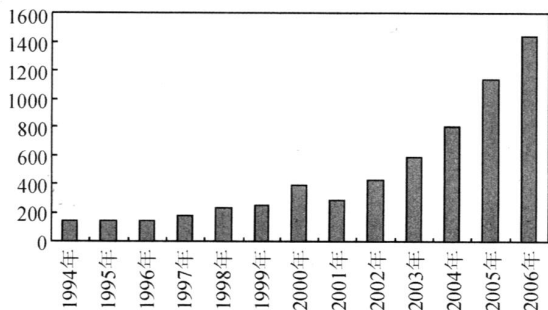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对美贸易收支顺差 (亿美元)

资料来源:亚洲发展银行数据库,中国商务部数据库。

图2记录了中国对美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变动情况,这一顺差也是引起中国经常收支出现顺差的主要原因。比较图1和图2,我们可以看到,从1994年到2003年为止,尽管中国对美国的低工资竞争优势正在缩小,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收支顺差却呈现出明显扩大的趋势。从2003年到2006年,中国工资维持了两位数的增加,年均实际工资涨幅高达12%,同一期间,中国对美国贸易收支顺差却从近500亿美元规模上升到1442亿美元。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工资水平的飞速上升和中国低工资竞争优势的急速下降并没有起到抑制中国对美贸易收支顺差的作用。尽管工资不是影响贸易收支顺差的唯一因素,但通常,低工资竞争优势一直被视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动力。因此,从常理来看,中国对美相对工资和对美贸易收支顺差的同步增长实属反常现象。

针对以上问题,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超过了工资的上升速度,因此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不仅抵消了工资上升对企业竞争力产生的负面影响,而且还起到了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的作用。在讨论中国贸易收支顺差原因时,人们对工资成本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劳动生产率的重视程度,但实际上,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工资的变化扮演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二者都是影响产品劳动力成本的主要因素。

二、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关系

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分析框架中,工资水平或收入水平完全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现实经济也反应了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这一联系,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之所以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是因为前者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后者。表1反映了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变化之间的连动关系,这一资料非常客观地显

示了劳动生产率变化对工资变化的影响。

表1 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的变化

时间	年平均增长率(%)	
	劳动生产率	实际工资
1948~1973年	3.0	3.0
1973~1996年	1.0	0.7

资料来源: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431页。

从理论上讲,如果不同国家之间的工资水平能够完全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那么这些国家生产同类产品的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将会相等,其产品的竞争力也会相等。这一状况意味着高劳动生产率优势可以完全抵消高工资劣势,因此,低工资国家无法享受低工资竞争优势。但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特殊的经济环境会使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出现偏离现象,这一偏离不仅会影响到一国经济的对外竞争能力,而且还会影响其经常收支的变化。

现在,我们具体分析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变化对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为了构造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首先,我们定义劳动生产率为工人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通常,劳动生产率越高,工人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越多。如果我们假设工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工资保持不变,在这一状况下,工人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每个产品包含的劳动力成本就越低,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如果我们做出相反的假设,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发生变化,即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数量保持不变,在这一状况下,工资的上升必然会提高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

以上分析表明,并非只有工资水平能够影响劳动力成本,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变动都会影响到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依据这一联系,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超过工资的上升速度,那么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会出现下降趋势,与此相对应,一国的对外竞争力会相应上升。反之,如果工资的上升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其结果,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会有所上升,一国的对外竞争力会相应出现下降趋势。还有一种情况是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不发生变化,因而一国的对外竞争力也不发生变化。从理论上讲,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充分就业状态下。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会引起企业利润的上升,后者会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在充分就业状态下,这一调整会引起工资的增长,只有在工资的增长速度赶上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时,超

额利润才会消失,企业才会停止扩大生产,这意味着工资的上升幅度必然等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用以下数量联系表示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对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L = W/Q \quad (1)$$

在公式(1)中, L 为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 W 为单位时间内的工资, Q 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即劳动生产率。

根据以上公式,我们假设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 $L_c = W_c/Q_c$,美国的这一成本 $L_u = W_u/Q_u$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美国劳动力成本的大小并非取决于两国工资水平 W_c 和 W_u 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两国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 W_c/Q_c 和 W_u/Q_u 的大小。即使假定中国的工资水平 W_c 远远低于美国的工资水平 W_u ,如果中国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大于美国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即 $W_c/Q_c > W_u/Q_u$,那么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将高于美国。在其他成本相同的情况下,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将低于美国。中国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即 $W_c/Q_c < W_u/Q_u$ 的条件是中国在工资成本方面的优势必须大于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这一优势表现为中国工资对美国工资的比率小于中国劳动生产率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即 $W_c/W_u < Q_c/Q_u$,这一状况意味着中国在工资方面的竞争优势要大于中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劣势。在这一状况下,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与美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对外竞争力处于有利地位。这一状况是导致中国对美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和引发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重要诱因之一。

三、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的静态影响

为了便于说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我们构建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我们假定中国与美国具有同样的工资分配比率,并假定该比率为,这一假定意味着不管美国与中国的工人生产多少产值,其工资报酬占产值的比率都等于。另外我们还假定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价格等于单位产品成本,并假定该价格和成本为 C 。在这一假设条件下,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值等于该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 Q 乘以单位产品的价格 C ,于是有:

$$W = CQ \quad (2)$$

在公式(2)中,因为随着产值 CQ 的增加,工资 W 会同比率增加,因此工资 W 的上升速度,等于劳动生产

率 Q 的上升。另外,因为我们已经假定中国与美国具有同样的工资分配比率,因此,两国的工资之比应该等于劳动生产率之比。

在建立以上模型后,我们将通过具体案例考察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对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表2列举了三种不同的情况。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分别假设中国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为1,在此基础上,依据中美之间的工资比率和劳动生产率比率,我们可以换算出美国对应的数据。

美国劳工部每年都要公布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根据劳工部的资料,2004年,中国工资等于美国工资的3%,如果按照公式(2)的结论进行推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应该等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3%。基于以上理由,在表2的例1中,我们假定中国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同为美国的3%。但是在现实经济中,两者或多或少会出现偏离,不过大体上会保持一致的变化趋势。正如我们在表1中看到的那样,从长期的变化趋势来看,美国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非常接近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如前所述,二者的接近程度与是否保持充分就业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一国经济能够保持充分就业的状况,那么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就更有可能保持同步上升的趋势。另外,从两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如果两个国家都能长期保持充分就业的状态,那么,二者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应该大体等于工资水平的差异。这是因为,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市场竞争机制会促使两国之间的工资水平差异大体等于劳动生产率差异,如果二者之间出现偏差,市场会自动纠正这一偏差。

现在我们具体考察这一调整过程。在中国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即 $L_c < L_u$ 的情况下,中国产品的价格会低于美国价格,其结果,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会有所上升,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会有所下降。美国需求的这一变化引起中国生产规模的扩张和美国生产规模的缩小,并进而引起中国工资水平的上涨和美国工资水平的下降,而工资的这一调整最终使中美两国之间的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趋于一致,即 $L_c = L_u$ 。根据前面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两国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相等 ($L_c = L_u$) 的条件为两国工资水平之比等于劳动生产率之比 ($W_c/W_u = Q_c/Q_u$),如果前者小于后者 ($W_c/W_u < Q_c/Q_u$),而且,如果劳动生产率之比 (Q_c/Q_u) 保持不

从公式(4)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把劳动力成本换成全部成本,也不会影响分析的结论。

变,那么两国的工资之比 (W_c/W_u) 会因为中国工资的增加或美国工资的下降而相应上升,从而实现工资之比等于劳动生产率之比的均衡条件 ($W_c/W_u = Q_c/Q_u$)。

表 2 2004 年中美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比较

案例	国家	工资水平 (单位时间工资)	劳动生产率 (单位时间产量)	单位产品 劳动力成本
公式	中国	W_c	Q_c	$L_c = W_c/Q_c$
	美国	W_u	Q_u	$L_u = W_u/Q_u$
	中国/美国	W_c/W_u	Q_c/Q_u	L_c/L_u
例 1	中国	1	1	1
	美国	33.3	33.3	1
	中国/美国	3%	3%	100%
例 2	中国	1	1	1
	美国	33.3	28.6	1.16
	中国/美国	3%	3.5%	86%
例 3	中国	1	1	1
	美国	33.3	30.3	1.1
	中国/美国	3%	3.3%	90%

注:例 2 数据参考 Bergsten 等 (2006)。

以上是基于简单模型的分析,如上所述,尽管从长期的趋势来看,中美两国的工资之比会收敛于劳动生产率之比。但是,在特定的发展时期,二者之间有可能出现暂时的偏离。表 2 的例 2 和例 3 揭示了这一可能性。例 2 使用了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与国际经济研究所联合研究报告的数据。该数据显示,2004 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 3%,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 3.5%。依据这一数据进行推算,如果中国的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为 1,那么美国为 1.16,因此,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大体等于美国成本的 86%。表 2 的例 3,使用了全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数据,依据例 3 的数据进行推算,中国的工资为美国的 3%,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 3.3%,由此可以知道,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接近美国成本的 90%。以上例 2 和例 3 都表明中美工资差距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即出现了 $W_c/W_u < Q_c/Q_u$ 的情况,这是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拥有竞争优势和中国对美贸易收支出现顺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出现以上情况有两种可能性:其一,中国的工资水平调整受到大量潜在过剩劳动人口的限制,大量农业后备劳动力的存在减缓了工资上升的速度。我们在前面的论证中,曾假设美国与中国的工资分配率相等,但实际上受大量失业人口的影响,中国的工资分配比率要低于美国。其二,发达国家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意味着把高劳动生产率转移到了中国,这表明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会加速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在中国劳

动生产率 (Q_c) 的上升速度快于工资 (W_c) 的上升速度,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保持同步增长的情况下,中美工资差距的收敛速度必然低于两国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收敛速度,从而导致 $W_c/W_u < Q_c/Q_u$ 局面的出现,其结果,中国单位产品劳动力成本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持低于美国的局面 ($L_c < L_u$)。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增加会引起持续性人民币升值压力。

四、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变化的动态影响

以上我们主要从静态的视点考察了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对中美贸易和汇率的影响。现在,我们从动态的视点来分析这一影响。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和相互作用以及二者对产品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是我们理解中美贸易收支失衡原因的关键所在。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我们无法单独用低工资成本竞争优势解释中国对美贸易收支为什么会出现顺差,以及为什么人民币会面临升值压力。1994 年以前的中国工资水平远远低于 21 世纪初期的工资水平,但那时中国的贸易收支多数年份为逆差,而且人民币一直面临贬值压力。另外,从图 1 可以看到,1994 年以后,中国工资的上升速度远远高于美国,其结果中美工资水平的差异趋于缩小,但是这一变化并没有起到减少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的作用。这一时期,贸易收支顺差反而出现了扩大

的趋势。

为了解释以上现象,我们必须考虑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之所以得到提高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超过了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这一变化起到了降低产品劳动力成本的作用。图3反映了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指数增长的情况。该图以1980年的数据为基数(设定为100),纪录了二者的变化情况。从图3可以看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实际工资增长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加快了上升的步伐,这使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的增长出现了巨大的差距。这一差距降低了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这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能够持续维持经常收支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因为单位产品劳动成本的下降会引起价格的下降,因此,这也是9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倾向的重要诱因之一。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在对公式(2)式进行变形的基础上,给出下面的公式(3)式,并对公式(3)取对数并微分得出公式(4):

$$C = 1 / (W / Q) \quad (3)$$

$$dc = dw - dq \quad (4)$$

如前所述,在公式(3)中, C 为生产单位产品的总成本,为工资分配率,即劳动报酬占产值的比率。在竞争的市场上,通常成本等于价格,而所有商品价格的总和等于总收入,因此工资分配率大体等于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这一份额通常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例如,就美国而言,该数值在1960~2000年的40年里,基本维持在70%。因此,我们可以把 C 视为常数。根据这一假设,对公式(3)取对数并微分可以得出公式(4)。其中 dc , dw , dq 分别为产品成本、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通常当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 dq 超过工资的上升速度 dw 时,产品成本 dc 会出现下降趋势,这一变化引起本国出口竞争力的上升和贸易收支顺差的增加,而贸易收支顺差一方面会增加外部需求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会引起本币汇率的升值压力。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如前所述,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快于工资的上升速度,即出现 $dq > dw$ 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无限量劳动力供给抑制了工资上升速度;其二、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了 dq 的上升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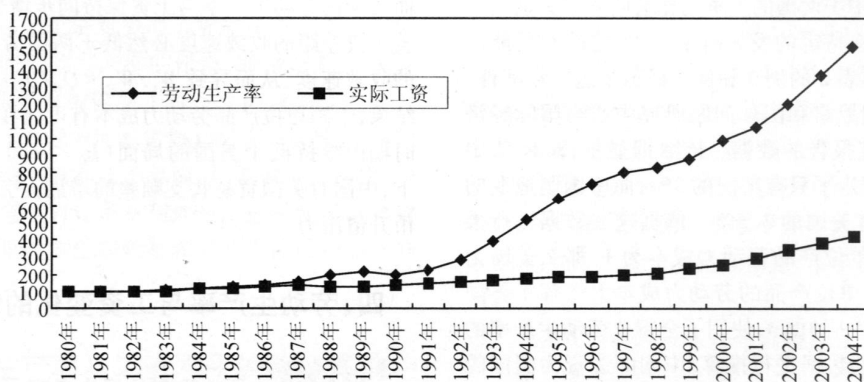


图3 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指数的增长差异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版。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中,人们通常认为人民币升值压力来自低工资竞争优势。正因为如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是美国制造业的 $1/20 \sim 1/30$,即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产品仍然具有竞争优势;假定人民币升值100%,以美元表示的中国工资水平增加一倍,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只是美国的 $1/10 \sim 1/15$,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削弱中国的对外竞争能力。这一观点不仅忽视了工资水平与产品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异,而且也忽视了劳动生产率对产品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从表2的例2和例3数据中可以看到,如果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

成本比美国只低10%~14%左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将很快丧失对外竞争能力,也不意味着中国工资只有10%~14%的上升空间或人民币只有10%~14%的升值潜力。从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来看,中国工资是美国的 $1/20 \sim 1/30$,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只有约美国的 $1/20 \sim 1/30$,这一差距为中国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图4反映了中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从该图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一直快于美国,这是我国实现高速增长的基本

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经济科学译丛书,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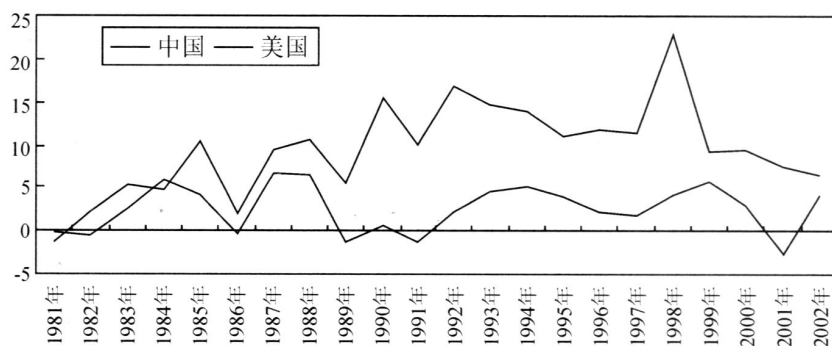


图4 中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的比较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动力之一,也是我国企业能够保持动态竞争力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一有利条件源于“后发优势”,即我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积累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大,中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内工资水平的潜力就越大,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就越大。

五、结 论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技术追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可以利用的优势为“后发优势”;其二是劳动生产率的追赶。这是技术追赶的必然结果;其三是工资水平的追赶。劳动生产率的收敛必然引起工资水平的收敛,而工资水平的收敛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收敛,这正是经济现代化所追求的目的所在。在实现以上“三个追赶”的过程中,由于无限量劳动力供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工资的上升速度,因此,中国工资水平的追赶速度总体上要慢于劳动生产率的追赶速度。二者之间的这一差距,在整个“追赶期”,会通过成本优势,助长贸易收支顺差并形成持久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一过程中,即使人民币升值有可能暂时削弱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但是只要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快于工资的上升速度,那么二者之间的这一差距会重新恢复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引起贸易收支顺差规模的扩大。

另外,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动态变化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我们可以借助公式(1)的数量关系考察这一影响。如前文所述,市场的均衡条件是 $L_C = L_U$,而实现 $L_C = L_U$ 的条件为 $W_C/W_U = Q_C/Q_U$ 。技术追赶的影响表现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引起我国劳动生产率 Q_C 的上升和 Q_C 向美国劳动生产率 Q_U 的收敛。 Q_C 向 Q_U 的收敛引起中国工资水平 W_C 的上升和

中国工资 W_C 向美国工资 W_U 收敛,而 W_C 向 W_U 的收敛将实现我国生活水平向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收敛。以上追赶之所以能够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后发优势”,即我国引进和吸收已有技术积累的速度要快于发达国家发明新技术的速度。“后发优势”为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劳动生产率差距、工资差距,以及经济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提供了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 [1] 张幼文. 新开放观. 人民出版社, 2007.
- [2] 徐明棋. 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国际金融研究, 2006(4).
- [3] 姜波克, 陆前进. 汇率理论和政策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 [4] 麦金农. 实行新的汇率政策: 中国会步日本的后尘陷入流动性陷阱吗. 国际金融研究, 2005(11).
- [5]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编. 东亚奇迹的反思. 王玉清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6] 周宇. 人民币升值加剧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 世界经济研究, 2006(11).
- [7] Balassa, Bela.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Semi-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8] Bergsten, C. et al.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IIE, 2006.
- [9] Cooper, Richard N. Living with Global Imbalances: A Contrarian View. IIE, 2005: 5-3.
- [10] Dooley, Michael P., 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 An Essay o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NBER Working, 2003: 9971.
- [11] Glodstein, Morris and Nicholas Lardy. China's Role i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IIE, Working, 2005: 5-2.
- [12]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Selected Economic Writings of W. Arthur Lewis.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 [13]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World bank, 1993.

(责任编辑:朱 颖)

Contents & Abstracts

The Instructions about the Index of the Power Nation in Foreign Trade: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ories of GPNS

Zhang Yabin Li Feng Zeng Zheng(3)

Is China a large nation but not a power nation or a large and power n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is paper has built a power nation's index system, and we have got three factors of judging the power nation through an empirical study with the factor analysis, they are the trading efficiency factor, the trade structure factor, and the environment factor.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uses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to prove that China is a large nation but not a power nation, China is at the lower chain in GPNS. In order to change itself from the large nation to the power nation,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trade benefit, the trade structure and the trade environment.

The Deterioration of China's Net Barter Term of Tr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Impact Factors

Han Qing(9)

China's NBTT has always been deteriorating, toward which this paper makes an posi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impact factors using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it turns out that real exchange rate, imports of preliminary goods, exports of manufactured goods and surplus of balance of payments all deteriorate our NBTT to a different extent in the long run, among which manufactured goods exert the most negative effect. But this deterioration is an inevitable contribution that China has to make to the world as a huge economically growing countr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and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meaning of terms of trade has changed.

Elements Divis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Xu Yi(15)

There are two new characterist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ne is that there are more intermediate goods in the world market than ever; the other is the trade volume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grows faster. We think that it is elements division which makes these phenomena occur. We extend Ricardo model to analyze elements division and find that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benefit from the elements division. As for big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omestic elements divis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duce their dependence on the world market.

The Differences i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Wages and the Trade Un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U.S.A

Zhou Yu(20)

At the beginning of 21 century, not only the wages increase in China is quicker than U.S.A, but also the speed of the increase of wages is much quicker than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It should reduce the Chinese trade surplus. However, this has not happened actually. On the contrary, Chinese trade surplus keep increasing even quicker than before. This is not a normal phenomenon.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causes from the view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wages.

The Essence of Modern Financial Risks from the Viewpoint of Subprime Turmoil

Sun Lijian Peng Shutao(26)

U.S. Subprime turmoil in 2007 has fully unfolded the essence of modern financial risks.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issues of differentials in consumer credit, risk contagion in asset securitization, conflict of efficiency resulted from mac-